



中美商人团体与 近代国民外交

(1905—1927)

ZHONGMEI SHANGREN TUANTI
YU JINDAI GUOMIN WAIJIAO

贾中福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美商人团体与 近代国民外交

(1905-1927)

ZHONGMEI SHANGREN TUANTI
YU JINDAI GUOMIN WAIJIAO

曹中福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美商人团体与近代国民外交: 1905—1927/贾中福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7-5004-7356-5

I. 中… II. 贾… III. ①经济史—中国—1905—1927
②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1905—1927 IV. F129.5 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9192 号

责任编辑 张小颐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高丽琴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8

插 页 2

字 数 201 千字

定 价 23.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贾中福的著作《中美商人团体与近代国民外交（1905—1927）》终于要出版了，可喜可贺。这本著作，是中福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的修改而定稿的，其博士论文的原题是《中美商人外交活动研究（1905—1927）》，是我于2002年申请到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商人外交与近代中国的殖民地化与反殖民地化》的一部分。题目的改变，说明作者意欲以商人的外交活动观察国民外交。

在近代中国，商人外交对于国民外交来说，既是其中的一个构成部分，又是其中的一个主流部分。从外交活动的主体来说，商人外交以商人主体，国民外交以国民主体，商人包含在国民之中，因而商人外交也是国民外交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国民外交所涵盖的范围比商人外交宽大。从商人的外交活动入手研究国民外交，自然有利于丰富和深化国民外交研究的内容。

从外交活动主体的能量来说，商人有较广的社会联系网络，上与官绅相维相系，外与洋商相连相争；又有较高的团体组织水平，各种固定的、临时的组织，不仅涵盖了全体商人，而且联结了其他的社会阶层。因此，商人具有较多、较强的外交诉求和外交能力，他们的外交活动不仅作为民间经济外交主干载体而在国民外交中频繁出现，而且作为社会的主要代表力量往往在诸多的国民外交运动中处于领导和核心的地位。

从外交活动的内容构成来说,国民外交所涉及的内容虽然很广泛,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但是涉及最多的还是经济方面。这是因为,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国民外交主要在重大事件中涉及,在平时涉及较少;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民间对外交流,较多发生在缺乏外交意义的分散的个体国民层面,而较少发生在富有外交意义的团体组织层面;经济方面的国民外交,则既在重大事件中有较多涉及,也在平时有较多涉及,既在个体国民层面有较多涉及,也在团体组织层面有较多涉及。而经济方面的国民外交,无疑以商人外交为主干载体。因此,从商人的外交活动考察国民外交,应该说是既可以抓住国民外交的主流,又可以深入到国民外交的核心。

关于中国近代商人外交活动的研究,虽在某些商会史和反帝爱国运动史、中外关系事件的研究中已有所涉及,但仍然处于初步研究的状态,且大多限于中国商人单方面的和发生在中国国内的外交活动的研究。中福的著作力图对中美商人双方的,并兼及在国内和美国展开的外交活动进行研究,既考察中国商人对美国政府和商人的外交活动,又考察美国商人对中国政府和商人的外交活动,也考察中美商人的外交互动关系。这样的研究,具有更广阔的视野,更丰富的内涵,更符合商人外交的命题,不仅对商人外交活动的研究富有开拓和深入的意义,而且更有利于揭示中国商人外交的特点。

中福的这一研究框架,与我当初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申请项目时所设定的目标相一致,也与我已有的少数相关个案研究相一致。现在,中福的这本著作,可以说是在这一框架下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研究的第一项成果。在近代中国的商人外交活动中,发生最频繁和影响最主要的是中日、中美两个方面,其次是中英方面,中福的这本著作承担了中美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较好的成

就。因此，作为我的《商人外交与近代中国的殖民地化与反殖民地化》课题的一个支课题，中福的著作可以说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我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和感谢。

当然，中福这样的研究自然会受到资料收集困难的限制。关于商人外交的研究，本来就没有比较集中、系统的资料可以利用，加之他的研究框架还要包含美方的内容，使资料的收集更为困难，特别是有关中国商人在美国进行外交活动，以及美国商人在其本国进行对华外交活动的资料不易获得。为此，他竭尽全力，四处查找，终于获得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资料，使研究得以完成。正是由于美方资料的难得，也使他的研究程度必然受到限制，著作中在中国商人在美外交活动，以及美国商人在其本国进行对华外交活动方面的研究显得有些单薄，这是其美中不足之处。不过，做到现在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步。我相信，中福的这本著作，会给近代中国商人研究和经济史研究、中外关系史研究增添新的色彩，会给读者带去不少新的信息。

虞和平

2008年8月8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目 录

绪论	(1)
一 近代国民外交的内涵	(1)
1. 近代国民外交及其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1)
2. 近代国民外交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其历史意义	(5)
3. 近代国民外交与当今民间外交内涵之异同	(12)
二 商人团体与近代国民外交的关系	(15)
三 文献综述	(17)
四 本书的篇章结构	(19)
第一章 1905 年抵制美货运动:以近代国民外交为 视角	(23)
第一节 国民外交的新理念及新式商人团体的组织 作用	(23)
第二节 国民外交的状况和意义	(28)
第二章 清末民初中美商会的互访与合作	(36)
第一节 中美商会互访概况	(36)
一 1910 年美国实业团访华	(36)
二 1915 年中国实业团访美	(54)

2 中美商人团体与近代国民外交(1905—1927)

第二节 中美商会的合作	(73)
一 中美商会合作的提出及其内容	(73)
二 中美商会合作的结果	(87)
第三节 中美商会互访的影响	(95)
一 中美商会交往的进一步加强:以 1917 年 罗司率实业团访华为中心	(95)
二 中美商会互访对中美商务的影响	(103)
三 中美商会互访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109)
 第三章 华盛顿会议时期中国商人团体的外交参与	(117)
第一节 近代国民外交的洪流	(118)
第二节 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商人团体的活动 及其主张	(127)
第三节 反对鲁案直接交涉和开展赎路运动	(133)
第四节 商人团体外交参与活动的评价	(149)
 第四章 华盛顿会议后中美商人团体与国民外交的进一步 发展	(156)
第一节 太平洋商务会议:中国商人走向国际政治 经济舞台的重要一步	(156)
一 一次走出国门的直接国民外交	(156)
二 力图改善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	(165)
三 太平洋商务会议的成效与影响	(174)
第二节 20 世纪 20 年代美商会的对华 “国际共管”论	(184)
第三节 中美商人团体围绕 1923 年中国商标法开展 的国民外交	(192)

一	1923 年中国商标法颁布后的中外政府外交 …	(192)
二	外国商人团体反对中国新商标法及其作用 …	(195)
三	外国商人团体反对中国新商标法的实质 ……	(199)
四	中国商人团体的抗争 ……………	(203)
第四节 关税特别会议前后中美商人团体的外交		
	参与活动 ……………	(207)
一	20 世纪 20 年代中外力争关余用途的斗争 ……	(207)
二	关税特别会议前后中国商人力争关税自主的 斗争 ……………	(213)
第五章 中美商人团体参与近代国民外交的总体认识 … (221)		
一	中美商人团体参与近代国民外交概况 ……	(221)
二	中美商人团体参与近代国民外交的时代 特点 ……………	(225)
三	中美商人团体参与近代国民外交的作用和 意义 ……………	(229)
主要参考文献 …………… (235)		
后记 …………… (245)		

绪 论

一 近代国民外交的内涵

1. 近代国民外交及其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国民外交”一词最早大约出现于20世纪初期。1910年美国太平洋沿岸商会代表团访华，并受到以中国商会为主的商政各界的欢迎，当时的报界称赞此次活动开“国民外交之纪元”^①。这是“国民外交”一词较早以文字形式出现。五四运动时期，关于国民外交的各种主张异彩纷呈，各种国民外交团体也纷纷成立，胡愈之将之称为“国民外交时期”^②，国民外交思想随之在这一时期得到发展。华盛顿会议期间和五卅运动时期，以及此后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期间，国民外交思想得到进一步丰富，呈现出社会化倾向。正如当时舆论所言，此时“‘国民外交’四字，几成今日之习惯名词”^③。

20世纪初期国民外交及其思想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特定的时代背景，它既是“人民主权”思想在外交领域的具

① 《国民外交之纪元》（社论），《民立报》1910年11月15日。

② 胡愈之：《国民外交与国际时事研究》，《东方杂志》第23卷第1号，1926年1月。

③ 《国民外交》，《申报》1926年1月30日。

体体现，也是此时中国国内外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

首先，“人民主权”思想的广泛传播为国民外交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以“人民主权”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始传入中国，鸦片战争的无情炮火击碎了中国人“天朝大国”的梦境，也迫使一部分人开始初步了解西方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当时的梁廷枏、徐继畲、魏源等就非常称颂英、美等国“国事决于公议”的多数制民主原则。^① 戊戌维新时期是西方民主思想传播的又一个重要时期，维新派除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资源外，更多地借用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武器为变法寻找理论根据。他们认为，民权思想的薄弱是国家羸弱之源，兴民权是救衰起弊的思想武器，因此提出政治改革“当以兴民权为真际”^②。他们开始介绍西方近代的天赋人权思想和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思想和国家思想在这一思想启蒙过程中开始萌芽、发展。严复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天赋人权思想作了有力论证。他于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辟韩》等文章，在介绍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和社会契约论的同时，从社会起源上论证天赋人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认为国家组织的唯一法则是平等自由的权利。严复、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的舆论宣传在当时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与此同时，近代国家观念也开始萌芽，“国民”一词也逐渐流行。梁启超的《新民说》就对国家思想做了高度概括，他指出：“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③ “人民主权”思想和国家观念是国民外交思想的根基，

① 耿云志等：《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② 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2页。

③ 吴嘉勋、李华兴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8页。

所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为近代国民外交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

随着西方民主思想的传播,清末有人就指出外交并不仅是宫廷、少数官僚所专有,“外交之本体实在国民”,“民气”为政府外交之后盾。这是“人民主权”思想在外交领域的具体体现。1905年12月,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外交报》发表了《论民气之关系于外交》一文。该文认为:“积民而成国,国有外交,即国民与国民之交涉也。国人不能人人自立于外交之冲,于是有外交当局以代表之。代表者,所权之利害,即国民之利害也;所执之政策,亦国民政策也。”作者从外交的本源上阐释了外交的本体问题,意即外交的本体在于国民,外交当局仅是代表国民行使外交权而已。该文还激烈批评清朝外交以京师、官吏和当局者的感情为本体,造成国民受害无穷的现实,也从当时国民在争回路权、抵制美约运动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意识到“民气”对于外交的重要性。他指出,这些运动“皆爱国心之所见也。虽造端尚微,若由是而及焉,其势力可以无量,而外交当局之所得而凭借者,其亦可以无量。吾愿外交当局鉴于民气之大可凭借而深悟外交之本体实在国民,一扫我国畴昔外交家之僻见也”。总之,“外交本体实在国民”,所以解决外交问题要以“民气”为后盾。^①至于国民如何参与外交,当时最流行的主张就是,国民通过国会参与外交事务。“向使国会早开,外交事件,人民得参预其间。集众听以为聪,则良谋自出;据群心以为固,则御侮无难。”^②这些言论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国民对清朝外交的极为不满和对参与外交的强烈诉求。1909年清政府在中英关于安徽铜官山矿权的谈判中

① 《论民气之关系于外交》,《外交报》第130期,1905年12月。

② 《论国会为治外交之本》,《外交报》第216期,1908年8月。

无视国人无条件收回矿权要求的做法，舆论更是一片责备之声：“国民为外交之主体，故对付困难之外交，莫不以民气为唯一之后盾。宇内诸邦，所不遵此轨道者，惟吾国耳。”^①

强调“外交本体实在国民”，“民气”为外交之后盾，这种思想反映了当时国民的民主意识和国民意识的增强，国家前途系于国民的责任心，外交问题也不例外。

其次，近代国民外交及其思想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环境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有关。中国近代历史充满着苦难和屈辱。鸦片战争以来，腐败的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进攻下显得软弱无能，战则丧师失地，和则赔款损权，中国逐渐由一个独立完整的国家沦落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强邻环列”、“瓜分豆剖”的局势下，中国的外交活动也一再陷入被动，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一落千丈。中华民国建立后，这种政府无能、外交软弱的被动局面也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皖系、直系、奉系军阀相继轮换控制北京中央政权，他们内部派系林立，内战连绵不断，政局极不稳定，中央权威大大削弱。而在这一时期，各帝国主义势力仍然根深蒂固，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日把争夺太平洋地区作为其实现世界霸权的重要一环，中国处在太平洋地区外交的旋涡上。对于中国外交来说，这本是灵活利用各国矛盾争取和平平等的极好机会，但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政府外交却步履艰难，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外交也不是一帆风顺，这些都是中国人民亲眼目睹的事实，也与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外交成果有着极大的距离。总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政府实行的“屈辱外交”往往难以尽如

^① 《社说——论外部对外对内之谬妄》，《民呼日报》1909年6月23日。

人意，国民要求参与外交的呼声也越高。巴黎和会时期、华盛顿会议时期都是中国国民外交最活跃的时期，国民外交思想在国民外交实践活动中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外交思想的产生包含着救亡图存的因由。

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也有利于国民外交思想的发展。一战结束后，传统的秘密外交体制成为各国众矢之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条”和平纲领，提出各国在外交事务中“均须开诚布公”和“以国际之公意”为准则。他提出，在战后处理殖民地问题上“须推心置腹，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还提出要组织国际联合会，“为各国交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及土地统辖。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权利”^①。列宁也在《和平法令》中严厉谴责帝国主义的秘密外交，宣称：“我们是反对秘密外交的，我们要在全体人民面前公开行事。”^② 威尔逊的言论尽管带有极强的理想化色彩，但在中国思想界曾轰动一时，影响很大。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就说：“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这说明威尔逊的言论使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很大错觉，而反对传统的秘密外交，实行公开外交就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弱小国家人民追求的一个共同目标，中国也不例外。反对秘密外交为国民外交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机遇，它也自然地成为国民外交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

2. 近代国民外交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其历史意义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国民外交思想在国民外交运动的推动下

① 《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演说（1918 年 1 月 8 日）》，《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17—1932），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86—189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57 页。

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这主要表现为宣传、介绍国民外交的著作、文章大量涌现。这些著作主要有钱基博的《国民外交常识》(商务印书馆1919年出版)、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陈立廷的《国民外交》(青年协会书局1927年印行)、陈耀东的《国民外交常识》(新月书店1928年出版)。同时,各大报刊也争相宣传、引导国民外交,《申报》、《东方杂志》、《现代评论》、《上海总商会月报》等多是有关国民外交的报道和评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幼雄的《民众外交方式》(《东方杂志》第22卷第17号)、胡愈之的《国民外交与国际时事研究》(《东方杂志》第23卷第1号)、燕树棠的《中国的外交》(《现代评论》第二周年纪念增刊)、《国民外交与群众运动》(《现代评论》第3卷第78期)、方椒伯的《中日问题与国民外交》(《上海总商会月报》第5卷第4号)等。这些论著的大量发表,一方面反映了国民对于国民外交的关注,另一方面也使国民外交思想大为丰富。

国民外交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还体现在它的普及性,这主要是由于国民外交运动中的广泛群众参与而促动。此时的国民外交运动蓬勃发展,巴黎和会时期和华盛顿会议时期是中国国民外交运动的两个高潮期,国民参与外交的热情高涨,一些重要的国民外交团体相继成立,1919年由熊希龄等在北京成立的国民外交协会和1921年11月成立的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就是两个重要的国民外交团体。伴随着国民外交运动的发展,国民外交思想也在人们的脑海中扎根发芽,“国民外交”一词成为一个大家耳熟的“习惯名词”、“流行名词”^①。这说明,国民外交思想已为大众所接受。

但是,关于国民外交的概念在此时并没有形成一个一致公认

^① 方椒伯:《中日问题与国民外交》,《上海总商会月报》第5卷第4号,1925年4月。

的看法。大体说来，国民外交主要有这样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指国家间的民间交往。在1919年2月国民外交协会讲演会上，干事陈介认为：“‘外交’二字范围甚广。就狭义的解释，即为因一种事故本国与他国有交涉之时是也。若就广义的解释，则平日无事时国家与国家、人民与人民寻常之交际亦可名为外交。……（一战后所言）国民外交者，所以表示非必有关系于国家事件，即平日无事之时，为世界和平起见，为本国与他国、本国人民与他国人民感情起见，均不能不讲国民外交。”^① 陈耀东则把国民外交分为柔性的和刚性的两种，他所说的柔性的国民外交是：“一国国民与他国国民间的一种交际，或是联络感情，或是交换意见，以使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融洽。”^② 他们两人都把国家间的民间交往活动作为国民外交的一项重要内容。

国民外交的另一层含义是指，在承认国民拥有外交权的前提下，国民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外交事务的活动，如国民表达对于外交的看法和主张，进行外交后援、监督等。而在这个层面上的国民外交，主要关系到两个问题，一是国民如何进行国民外交，二是如何处理国民外交和政府外交之间的关系。

对于国民如何进行国民外交，大家的主张各异。梁士诒承绪清末“国会为治外交之本”的主张。进而提出国民应通过国会表达外交主张，参与外交事务。他认为：“以外交惯例言之，国家订约条约须经元首批准，国会通过始能有效。因国会系由国民代表组织而成，若在共和国主权在于国民，其外交重要事件应通过国会以表示国民外交之精神。”因此，“国民外交之义，凡系

^① 《国民外交协会讲演会补志》，《晨报》1919年3月8日。

^② 陈耀东：《国民外交常识》，新月书店1928年版，第244—245页。

国家之人民对于国家之外交皆应负有援助之义务”^①。陈立廷等则强调社会舆论对开展国民外交的重要性，指出舆论是开展国民外交的利器。他强调，国民外交的利器是正当的舆论，我们应当注意制造舆论以监督政府的方策。^②钱基博也提出，政府要提倡、奖励人民设立研究外交问题的学社、党会，辅助报纸，以正确之指示，俾人民洞悉于外交真相。这是开展好国民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③燕树棠则把国民外交等同于民众运动。他说：“国民外交与群众运动，这两个名词，在实际上是指一件事情。每次群众运动都是因对外问题而发生，都是国民方面看见政府的无能与失败，要督促政府，援助政府，期望达到外交的胜利。”^④上述观点虽然存在着较大差异，但都是主张国民外交是对政府外交的一种间接参与，以支持或是督促政府外交。

既然国民外交是对政府外交的间接参与，在处理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关系上，人们就自然强调国民外交对政府外交的后援性。譬如，熊希龄等在1919年北京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会上，宣称该组织的目的是：“一方表示公正民意，一方力为政府后援。”^⑤但之后的社会现实却是，政府在外交事务上往往软弱无能，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因此，在1921年讨论全国国民外交大会章程时，有的代表就提出，国民外交大会“非为政府作后盾，系发表真正国民意见，如华府会议失败，国民当否认之”^⑥。最后通过的

① 《国民外交协会讲演会补志》，《晨报》1919年3月8日。

② 陈立廷：《国民外交》，青年协会书局1927年印行，第18页。

③ 钱基博：《国民外交常识》，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9页。

④ 燕树棠：《国民外交与群众运动》，《现代评论》第3卷第78期。

⑤ 《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会纪事》，《晨报》1919年2月17日。

⑥ 《全国国民外交大会消息》，《申报》1921年11月15日。